革命的歷史教訓

中研院院士張灝細說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革命情懷

文／陳寧

去年年底，時報文教基金會與洪建全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了一場有關「革命的歷史教訓」的演講，主講人是對中國近代思想史頗有研究的中研院院士張灝，果然，演講當天吸引滿堂的聽眾參與，長達三個小時的演講更是高潮迭起，在張灝教授不急不徐的解說之後，大家對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革命情懷也有更深刻的了解。

時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余範英表示，中國時報的大家長余紀忠先生以文人辦報，一直很重視中國知識分子的角色，解嚴前二十年，中國時報曾邀請胡佛及余英時教授擔任總召集人，策劃兩場大型的研討會，從歷史角度討論中國知識分子角色，這兩場研討會，張灝都應邀參加並提出「幽黯意識與民主傳統」的論點，顯現他在思想史的素養與根柢。現今社會精神浮動，更需要有大師來帶領我們做深層的人文探索，時報文教基金會也願意接續這個傳統，扮演教育社會大眾的重任。

張灝教授是在一九五七年從台大歷史系畢業，一九五九年到美國讀書，畢業後就留在俄亥俄州大學歷史系任教，前後約四十年，三年前應邀到香港科技大學教書。張灝自稱自己是一個「低調的自由主義者」，即使是返回華人生活圈仍偏處於香港郊區，絲毫沒有熱情參與社會的跡象。他覺得過去中國知識分子強烈改造社會的理念，已經是熱火燒天，推到雲霄了，不如低調一些還好。

張灝指出，中國的革命意識起於一八九五年，那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僵，帝國主義入侵，由慢轉急，國家進入空前危機，這危機不僅是列強瓜分中國迫在眉睫，還包括傳統政治制度崩潰、儒家核心文化思想頓然失落、社會經濟結構劇變三種轉型危機。科舉考試廢除後，讀書人失去社會結構上下流動的機制，卻透過沿海新式學堂吸收許多西方思潮，例如民族主義、自由主義、社會達爾文主義等都是在那個時候引進中國。

◆中研院院士張灝自稱自己是個低調的自由主義者。

張灝認為，當時讀書人還讀四書，影響很深。儒家的經世精神、世界大同，是高度的道德理想主義，在三綱五常為本的歷朝，並未影響中國政治，是一種「隱性的」烏托邦思想。而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的解放思想，發展到後來有「極端的人本主義」傾向，相信人定勝天、可征服自然萬物，這種思想當時進入中國衝擊已半世紀，催化了儒家的隱性烏托邦思想，合流起來，成為中國知識分子「革命」求變的底層心態。

自康有為等知識分子維新變法以來，每一次「求變」不成，就認為革命的幅度不夠大，而必須再做一次「徹底的改變」，中國上一世紀兩次大革命，中共建國與文革，就是累積整個中國知識分子這種求變能量的產物。

張灝說，毛澤東擁有崇

高的烏托邦思想，是他領導、掀起建國與文革兩次大革命的主要原因。而文革的終止也是這世界自法國大革命以來，所有大革命的終止，毛澤東驗證了烏托邦之不可信，正在於人性不是至善完美，除了他掌權以後的自我魔化外，計畫經濟對人性過於樂觀的結構設計也是行不通的。

三十到五十年代的知識分子都傾向往左。張灝分析，儒家經世的道德感與共產思想對人的樂觀信任、唱高調到烏托邦，以致有「計劃經濟」這種制度的設計，兩者非常相近，「他們都看不見人性的『幽黯意識』，成為極端的人本主義者」。

張灝說，現在看文化大革命動員的能力，背後就是一種理念政治的理想在驅動，過度強調理念，很容易就走火入魔，抓到權力的政客不知不覺「魔化」了。人性在政治上的脆弱，透過中國知識分子的從政已經得到悲劇的試驗。

對照法國革命以後的民主歷程，中國革命的時間是嫌太短了。西方哲學家韋伯以信念能力、責任能力兩種取向，來檢驗政治準則，中國還需要時間建立。

張灝說，透視歷史經驗，如果非要他做一個選擇，他不得不說，理念崇高的從政者恐怕還不如一個投機的從政者，因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從政者常說「問心無愧」，他們都有這麼崇高的理念，當然是問心無愧，理念是他們自己來檢驗，當然檢測不出握在手上腐化的權力滋味。

◆與會大眾聆聽張灝細說知識份子的革命情懷。

張灝認為，知識分子缺乏公共理念似乎是現代化的總體趨勢，固然是一種危機，但是回頭看中國歷史的政治歷程，把「理念」運用在政治裡，麻煩也很大。他分析，從西元一八九五年以來，中國知識分子以理念從事政治，其結局常是悲劇。

張灝從中國歷史經驗來看，台灣目前的民主政治是極值得稱讚的成果。但是台灣也是剛學步的民主國家，特別應該要珍惜，應謹記中國理念政治的悲劇傳統，切莫走到極端狂熱。政治人物應有雙重取向的理想，政治的目標應崇高，可以有浩然正氣，但「所產生的後果，也必須承擔」，理念與責任缺一不可。